

※ 高友工教授紀念專輯 ※

開闢鴻蒙的時代光芒 ——高友工先生與抒情傳統

朱先敏* 整理

對談人：柯慶明（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鄭毓瑜（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二〇一六年十月底，高友工先生與世長辭。他退休前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為他降下了半旗，他的同事、朋友、學生——同時也是當代重要的學者——浦安迪（Andrew H. Plaks）、梅祖麟（Tsu-lin Mei）、孫康宜（Kang-i Sun Chang）等諸位先生於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一日為他舉辦追思會。而深受高先生所開啟的抒情傳統影響的臺灣中文學界，自然也被這哀痛的訊息激起了沉沉回聲。柯慶明老師與鄭毓瑜老師的對談，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高先生在比較文學學會發表〈知與言〉的時候，我當時修了殷海光先生的哲學解析，對分析哲學是不陌生的。所以對於高先生認為一個語言的表達可以做各種功能用，我當時是持不同意的看法，所以提問的時候我就盯住他，反覆辯論」。柯老師談起親炙高先生風采的經驗，說自己向來不為身分拘限，有疑問就要提出，於是一來一往地在演講會場直接與高先生對話。那場小辯論後來受限會議時間而簡單作結，但柯老師執著求知的精神卻讓高先生印象深刻，於是推薦了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一書，因而有了後續的交往。

「為什麼高先生要特別推薦徐復觀的書？妳覺得高先生會不知道同時期的其他新儒家的思想家嗎」？柯老師俏皮地問，鄭老師笑著搖頭。「高先生特別看重徐復

* 朱先敏，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觀由實踐理性轉向美感經驗的特質，這是其他新儒家的思想家沒有提到的」。柯老師如此解答，而他自己對高先生的一場追問也是源自於此。高先生試圖將「經驗之知」導向美學，然而柯老師卻覺得語言可用以認知，也可以傳達美感判斷。他舉了「生年不滿百」的詩句為例：「生年不滿百是一個認知，因為當時的人大多活不到百歲，它同時也是一種情緒語言，傳達對生命無常的憂慮。但是，生年不滿百是文學語言，並不是所有語言都具備這樣的功能，不然數學怎麼辦？」

柯老師的追問，高先生在〈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裏回答了。柯老師現場翻閱原文給我們看：「高先生按語裏提了徐復觀、傅瑞 (Northrop Frye)、耶考布森 (Roman Jakobson)、摩爾 (G. E. Moore)、維根斯坦 (L. J. J. Wittgenstein)、奧斯汀 (J. L. Austin) 這麼多位學者，但他們的論著卻沒有出現在後面論文的註腳裏，這是為什麼呢？」柯老師豪爽地大笑：「高先生是在叫我們多讀書啊！把前面提到的研究都先讀過了再談。」原來，當時有許多人向高先生請益，於是他乾脆在文中如同開書單一般，提供了後人按圖索驥的思考軌跡，其中不但有他自己融會中西的進路，也有注重當代哲學的學術背景。通過柯老師的經驗分享，再次展讀《美典》一書時，也彷彿身入其境地體驗了當年新學說引發的旋風，以及眾人爭相研讀、討論的學術盛況。

柯老師和鄭老師談論高先生的學術脈絡，從羅素 (Bertrand A. W. Russell) 「普遍經驗」的分析到瑞恰慈 (I. A. Richards) 以「意義的不確定，而尋求正解」談起，再到康德 (Immanuel Kant) 普遍的道德律與新儒家的實踐理性。顯然高先生早已經歷過這些思索，當他論述中國美學精神時，就成為豐厚的背景與土壤，從中生長出茂密的枝椏。

從語言論中國文化的美感精神

在追溯高先生思考路徑的過程中，鄭老師更試圖抓準高先生與前人不同的研究取徑：「高先生並不要處理分析哲學的議題，而是試圖突顯中國文化的一個面向——美學的面向，所以他的文章是以『中國文化史』為題，可以這樣說嗎？」柯老師：「對！」了一聲，然後說明：不同的文化風俗之中不會實現普遍理性，這是高先生標舉「中國文化的美學面向」的原因。不同於康德的「美」是純粹形式的，中國的美感經驗中卻有著理想性，如同「萬物靜觀皆自得」一句所蘊含的內涵和價值

觀。

除此之外，高先生也承接了耶考布森帶起的語言分析概念。語言如同數學程式可供分析，只要依樣運作就會達到固定的結果。這種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觀點，讓人聯想起六朝以降的對偶風潮，不同的是，隨著詩歌的發展，原本為求對仗工整而形成的許多奇異、新鮮的對句，慢慢地在追求形式整齊之外，衍生出深刻的意蘊。柯老師引用杜甫詩為例，「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對句中，「尋」與「常」原先是度量衡單位，因此與數字七、十是漂亮的對句，但「尋常有」和「古來稀」除了對偶之外，更寄託了詩人對人世滄桑的體會。高友工先生立基於耶考布森的語言分析，再更進一步探求字面外的深意，這正是其學說精采深刻之處。

高友工先生與梅祖麟先生合作的《唐詩三論》研究，不僅呈現了兩位上承耶考布森對語言的深入探討，同時也對中文學界產生影響。柯老師說，一九七〇年代的中文學界，研究路徑仍以考據、聲韻、訓詁為主，但即使是最典型的中文學者在論及文學研究時，也對高、梅二位先生的研究心服口服，認為做文學研究當如是，才稱得上客觀分析、科學研究。

由於不同領域的學者大加推薦，柯先生細細地研讀《唐詩三論》等相關論著，於是發現唐詩的語言分析固然是精采的學術演示，更重要的是，分析了語言之後，對於情意和美感經驗的捕捉。「我以自己的創作經驗做例子」，柯老師說：「作者意圖是無從驗證的，重要的是你讀到什麼、怎麼讀，能讓旁人也覺得你說得有道理。不是一定要作者自己這麼想才是對的，因為他也可能『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啊！」柯老師幽默地化用詩句。

「高先生注意到其他人忽略的議題，那就是，中國的頂尖哲人在闡述自己的學說時，都運用了詩歌的語言，比如老子的『上善若水』、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這是中國和西方對於語言的不同認識。西方人看到一個詞先想詞性、單複數、性質，但漢語不會這樣。一個詞、一個句子能夠同時兼有具體的描述、普遍命題和美感經驗」。柯老師進一步闡述高先生研究的獨特性。鄭老師於是追問，高先生把內在價值拉入了語言的客觀分析裏面，那對於一九七〇年代盛行於臺灣學界的新批評是不是也有所影響？柯老師認為，高先生為文學研究帶來的新思維在於：純粹對形式進行研究，其實不能完全解決藝術問題，經驗的意義不能被形式取代，新批評只能研究形式而已。這樣的新眼光，緩解了當時新批評的研究取徑已陷入被評為只是自由聯想的困境。

抒情傳統與中文學界的對話

從一九七〇年代高先生提出學說時振聾發聵的新局面，到當代抒情傳統已經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主題，鄭老師於是針對抒情傳統的學術現況發問：「王德威教授、陳國球教授、黃錦樹教授引入抒情傳統討論近現代文學，讓抒情傳統的詮釋範圍更廣大，而顏崑陽教授曾經批評抒情傳統這個理論的包覆性太大，對此柯先生有什麼看法？」

柯老師認為，抒情傳統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前者當然是以抒情詩為主，因為歷代創作的數量很多，又已經生成了相似的主題和共項；後者則是從詩擴散到其他文類的抒情現象。「中國文、史有自己的敘事傳統，跟國外的史詩不一樣，不是韻語而是散文。但你會發現最好看的、最經典的前四史，抒情性都很強。而敘事文學中特別動人的部分，其實都有抒情的時刻 (lyric moment)。比如垓下之圍項王敗了要唱歌、劉邦為小兒子趙王如意操心時也要唱歌，用歌來做敘述的焦點。甚至唐傳奇、《水滸傳》、《紅樓夢》也大量運用詩意的語言和詩歌。中國戲曲中，曲子也比故事來得重要」。柯老師舉了各種文類為例，說明抒情傳統以抒情詩為端點，逐漸將抒情性擴散到各類文學體裁的現象。

藉由對中國文學跨體裁的抒情性討論，兩位老師於是談論到中西對於文學的不同設想。柯老師從維根斯坦視語言為遊戲 (game)，詩 (poem) 的字源是製作 (make) 說起，說明西方的創作重視技巧、方法、形式，因此語言成為深入分析的途徑。而鄭老師則藉著柯老師提到，上帝造物只將「自我形相」放入「人」中，因而只有「人」有神性，與中國萬物皆有神性或靈性的對比，指出中國對於宇宙的討論更為豐富有趣，而不僅是將宇宙視為被造物來進行觀察。

試圖從語言形式跨足閱讀感受固然需要研究方法，但更多時候還需要倚靠直覺。高先生提出的理論著重「經驗之知」，但是創作者永遠會有媒介與經驗能否貼合的焦慮。「經驗是內省的、自我的，甚至是主觀的、價值的，那麼跟語言這個媒介配合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問題」？鄭老師於是發問。

「我跟你講，這就是高先生的研究最難得、最深刻的地方」。柯老師彷彿分享祕密般，壓低聲音說著：「他其實是透過非常深入的語言分析，甚至我們姑且稱之為閱讀現象學，但是，他是運用結構主義的語言分析，來談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

這就牽涉到一個字的形、音、義，如何一路變成句子，再到全篇連綴成的境界。」從同一篇的字句之間如何逐漸經營鋪陳，自經驗生發，搜尋適合材料，再到語言表達。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學研究並不講求這方面的進路，也不著重於語言學的分析，高先生的研究一舉突破了既有的窠臼，用新的眼光看待舊有的文學。「我跟高先生說啊，這是他的研究最深刻的地方，他回答我：『如果大家都這麼想就好囉！』」柯老師說著，呵呵呵地笑了起來。

回望高友工先生的研究貢獻

從〈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就已經展露出高先生對語言的關注，再到〈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下）兩篇，再一次顯露出高先生對於經驗與語言之間關係的掌握。鄭老師分享自己的閱讀感受，她認為從陸機極力描繪意念的難以捕捉後，思、意、言之間的距離就成了文學創作者與詮釋者企圖跨越而且不能忽視的大問題，而這樣的難題在高先生的研究中卻讓人看見解決的可能。

「高先生的貢獻在於對於語言多層次的分析」。柯老師一錘定音，指出高友工先生的時代意義。自從結構語言學出現後，人們開始對語言的多層次性有了認識，使得人們對語言、對知識、對世界的認識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結構語言學的特色在於，將語言的系統變成多層次，從音位、構詞，再到句法，進入文學之後語言的安排還牽涉到謀篇，這些元素一層一層地翻轉，讓語言經驗和實際經驗結合、轉化。結構語言學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而高先生充分掌握了結構語言學的由形、音、義的「辭」，進而觸及語言結構的「骨」，而發展為作品所顯現的「風」，以至於作品與人格情性一以貫之的「氣」，以此來解決文學問題。

「語言是結構性的，而結構的後面其實是經驗。結構性的經驗的發展，轉變成了很高的精神境界的表露，這是高先生的研究最為精采的部分」。柯老師如此作結。

高友工先生一九七八年來臺的發表和講學，是柯老師親身接近並被引領入門的青年時光；也是鄭老師撫卷展讀、再三讚嘆的閱讀體驗。時移事往，從一九七八年走到二〇一六年，高先生的時代意義越發突顯，對此兩位老師做了如此總結：「高先生沒有忽略當時很多哲學理論的發展，像他用耶考布森的時候，從一個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發展出來，但他其實反對純粹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而是出入當時的各種學

說，提出自己觀點。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不管知識論、人文科學、分析哲學，所以高先生還是從這裏進入，但超越了。」

從結構主義語言學、新出的文學批評理論到分析哲學，高友工先生搏扶搖而直上，藉著前人的立論基礎開闢了新的研究路徑。而在二〇一七年的後高先生時代，是不是能夠在高先生種下的大樹之上再翻出新綠？這就是下一個世代的任務了。